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

第三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

第三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

第三卷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三卷目录

R

饶长溶·····	(1037)	孙常叙·····	(1155)
饶宗颐·····	(1043)	孙德宣·····	(1160)
任铭善·····	(1054)	孙宏开·····	(1163)
容 庚·····	(1060)	孙良明·····	(1170)
		孙锡信·····	(1178)
		孙诒让·····	(1184)

S

单周尧·····	(1067)	唐 兰·····	(1190)
商承祚·····	(1072)	唐钰明·····	(1200)
邵敬敏·····	(1080)	唐作藩·····	(1207)
邵荣芬·····	(1084)	田小琳·····	(1216)
沈家煊·····	(1092)		
沈兼士·····	(1098)		
沈开木·····	(1104)		
施文涛·····	(1111)		
石安石·····	(1116)		
史存直·····	(1123)		
史锡尧·····	(1129)		
史有为·····	(1134)		
苏宝荣·····	(1140)		
苏培成·····	(1146)		

T

W

汪 平·····	(1227)
汪荣宝·····	(1233)
王福堂·····	(1236)
王辅世·····	(1242)
王国维·····	(1250)
王国璋·····	(1259)
王 还·····	(1265)
王敬骝·····	(1269)

王静如·····	(1274)	项 楚·····	(1424)
王 均·····	(1281)	萧 璋·····	(1435)
王理嘉·····	(1290)	邢福义·····	(1443)
王 力·····	(1296)	邢公畹·····	(1452)
王 宁·····	(1308)	熊正辉·····	(1458)
王士元·····	(1313)	徐德庵·····	(1461)
王维贤·····	(1319)	徐 复·····	(1467)
王 显·····	(1326)	徐烈炯·····	(1472)
王 尧·····	(1331)	徐仁甫·····	(1476)
王 铎·····	(1333)	徐世荣·····	(1482)
王 照·····	(1341)	徐思益·····	(1489)
王宗炎·····	(1345)	徐 枢·····	(1496)
韦 恂·····	(1350)	徐通锵·····	(1502)
魏建功·····	(1357)	徐中舒·····	(1511)
温端政·····	(1366)	徐仲华·····	(1517)
吴承仕·····	(1373)	许宝华·····	(1523)
吴大澂·····	(1379)	许国璋·····	(1528)
吴为章·····	(1384)	许嘉璐·····	(1535)
吴文祺·····	(1392)	许绍早·····	(1543)
吴玉章·····	(1397)	许世瑛·····	(1549)
吴宗济·····	(1403)	宣德五·····	(1557)
伍铁平·····	(1412)		

X

向 熹·····	(1420)
----------	--------

饶长溶 Ráo Chángróng

饶长溶（1930～ ），字永如，笔名舒市丙、丛一如、丁水华。福建省长汀县人。1956年9月广州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分配至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62年为助理研究员。1965年1月调新建的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2年10月任教于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1977年6月调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3年被评为副编审，任《中国语文》副主编，1989年被评为编审。兼任北京市语言学会理事，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客家方言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汀州客家研究会顾问。

饶长溶曾在丁声树先生等执教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二期）学习，并正式整理母语方言系统。后参加陆志韦先生领导的专题研究，负责副动词探讨。1960年后的三四年，在吕叔湘领导下参加第一组编写“现代汉语语法”书的前期工作。当时组内读名著，评介苏、美等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结合汉语实际讨论汉语特点、词类划分、句子分析方法等广泛的语法问题，受到基础的教育。1972年起在河北大学中文系编写教材，讲授“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及习作”，陪工农兵学员下厂下乡实习。1977年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饶长溶积极支持、参与组织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和沙龙式语法学术讨论会，参加筹办一些学术研究活动。1991年春与罗美珍牵头编写“闽西客家方言研究”。当年秋与李逢蕊、罗美珍牵头举办（福建龙岩）第一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专集。1993年秋与罗美珍牵头组织编写“客家话综合词典”。1997年8月与田小琳、刘月华、于根元、吴为章等共同发起举办（密云）联谊语法座谈会。

四十多年来，饶长溶在语言学领域里，着重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特别是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的调查研究，以及词语训释、客家话词典的编

纂工作。出版专著三部,发表论文四十多篇;领衔或(和)参与编辑出版《语法研究和探索》(一)至(七)论文集、《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语文评改五百例》、《汉语方言动词体貌论文集》等书籍。

饶长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求新见、评倾向两类。

一、承继前辈学者创新的科研精神,努力从事实中得出规律,求取新见。

《“很”+动词结构》一文,用“很听话、很叫人为难”和“很看了几本书、很看了几眼、很睡了会儿”两大类五小类材料,说明“很”不是修饰动词的,而是修饰动词结构的。指出,以《汉语》课本为代表的观点不够科学。通行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孤立地看待每两个语言片段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从结构层次上来分析语言现象,因而不能正确地揭示语法关系”。该文被认为是“早期对句法结构施以层次分析的成功范例”。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将该文列为“参看”文章。

《主谓句主语前的成分》一文,主要采用始发句、后续话语以及替代信号、关联词语等话语结构的理论方法,侧重对可以出现在主谓句主语之前或之后的近似成分,进行从形式到意义的分析比较,给出有凭有据的区别,取得了不同寻常的研究成果。该文连同《“很”+动词结构》、《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修饰》三篇,被全文收进学者誉为“精品集”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下册。

《“不”偏指前项的现象》一文,主要考察了“1. 不骑车/上班, 2. 不按规矩/办事, 3. 不应该/管”这三类否定词“不”只否定“骑车”、“按规矩”、“应该”等的事实,首次展现了汉语的双项动词短语句法结构里,“不”的语义只指向前项的情景,并再次显露了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的复杂情况。

《动宾组合带宾语》一文,列出诸如“负责看园子、增产清凉饮料、出丑谁”等双音节“动宾”组合再带宾语的事例,应用内外部结构分析和变换分析等方法,从组成、句法结构和语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解释。该文初次大量地展示令人感兴趣的新颖实例,被学者评为力作,经常称引。

《长汀话表可能的“V得”组合》一文,主要对“V得”、“V得O”、“V得C”、“V得OC”等组合的肯定、否定形式以及相应的同义格式进行描写分析,进而论证了两个问题。1. “V得C”(食得饱)的否定式不是“V唔C”(食唔饱),而是“V唔得C”(食唔得饱);2. “V得C”(食得

饱)和“可以VC”(可以食饱)叠成同义格式的重合式“可以V得C”(可以食得饱),这种事例——北京话也说,“那样我就可以看得清楚、可以读得通了”,从规范角度看,有同义重复的毛病,但从语言变化发展的角度看,从历时观点看,它记录了由此及彼演变的句法现象,是研究方言语法史的重要迹象。

《试论副动词》一文,选用“副动+宾+谓”这个框架,对绝大部分副动词进行检验,明确其主要语法特点是“不能单独做谓语,必须带宾语组成副动词结构与谓词结构连用”。

《“至于”、“关于”不像是介词》一文,特意指出:“至于”是“承接上文,表示另提一个话题或者一个事由”的连词。“关于”是“表示关涉、跟某人或某事相关”的动词,同“关乎(姑娘声誉)”、“属于(你)”这些必带宾语的动词类似,语源上与“有关于”这个组合有联系;并首次挑出、剖析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第2编)所举的绝无仅有的两个“关于”的例子(我们中国关于织女星也有同样美丽的传说;霍莫托夫同志关于纪律只是说了应说的一部分。)是“似是而不合格”的假介词,实属误判。

《再说次动词》一文,进一步揭露了三个问题:1. 英语介词的定义,不合乎汉语的实际情况;2. 次动词结构做状语是次动词的共同语法功能,有些次动词结构还可做定语,或做补语,或兼而有之,是类内次动词的局部语法功能,必须分清;3. 运用形式和意义结合原则处理兼类问题上,既要注意“词汇意义不同不等于词性不同”的一面,也要注意“词汇意义不同有可能导致词性不同”的另一面。动词用法“替”是“替换”义,次动词用法的“替”是“为”义,实质上表明二者的词性不同,语法意义不同。

此外,《“把”字句否定式》、《“把”字连句省略》等文,对此前有关问题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补充或修正。

二、关注语言研究态势,适时评说倾向问题。

80年代初,二三十所高等院校分组协作编写《现代汉语》新教材,提出如何“突破”中心词分析法所存在的问题。饶长溶通过书评《谈谈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的析句方法》一文发表看法。他称赞“修订本”的成分分析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层次·成分分析法”,符合汉语句子大都由层层结构体构成的性质,“既能定成分,又符合句子构造的

层次”，“自始至终贯穿了层次观点，逐层分析”，“顺情合理，有条不紊”。该文可看做 80 年代初期《中国语文》编辑部组织“汉语析句方法”讨论的先声。

《关于句法、语义分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主要评说当时语法研究方法上出现的两个问题。其一，认为 1980 年起在我国试验的“两个表述”分析法，大都只用于有限的动补句式，如“小猫吓跑了大耗子”，多年来几乎不见用于大点领域的动补句式或其他句式，比如“周新扔出去半块砖头”，“韩强跳上了台阶”，恐怕是方法本身缺少相应的可控制的形式标志，有待于改进或完善。其二，从语义、语义结构、语法意义三个方面评论了 80 年代初期以来古汉语名词活用为副词研究中“语义介词”的分析方法。比如，“（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译成“以客礼待之”，把“以（客礼）”称为语义介词。饶长溶认为，既是语义又叫“介词”这种叫法本身表明：继续分清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仍然是语法学者尚须努力的课题。联系到大学者在分析语义结构时也不经意地用了“宾语是补语的宾语”这样的表述，在语法研究上更有必要考虑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分析手段和用语。

饶长溶 1992 年在黄山市十学者学术座谈会上发言说：“三个平面既是方法问题，又是理论问题。说它是方法，因为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点多层次地研究语法；说它是理论，因为它是对语法本体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观。”“三个平面的中心问题，恐怕是（如何处理）语用。说语用是动态的，不错，但句子分析本身就不是静态的。什么是句子成分？语用、语义成分是不是句子成分？‘关于李家的亲事，我们讨论过了。’一般把‘关于李家的亲事’，当做语用成分，但它又是‘讨论’的受事，能说它与句法结构无关吗？如果有关，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

《议客家方言语音、语法的关系》一文，就时下客家方言语素单位的研究存在孤立地分析单位语音的现象，举出四项事例，尤以近年出版的三部梅县话词典所见名词、状态形容词后缀和动词后助词 [e] 或 [ɛ] 为例，进行详细的剖析比较，并指出如果侧重语音方面考察时，“不管用的是什么方法，都不能只给对象记写一个音就了事，必须注意与语汇、语法联系起来，才能准确地反映所讨论的对象，揭示它的客观规则”，以使“客家方言研究工作能进入一个较为深广的层面”。

饶长溶语言学著述目录

【专著】

“把”字句、“被”字句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实用语法修辞(与于根元、苏培实、徐枢合作)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汉语层次分析录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论文】

试论副动词 《中国语文》第4期, 1960。

“很”+动词结构(与范继淹、王福庭合作, 署名饶继庭) 《中国语文》第8期, 1961。

主谓句主语前的成分 《中国语文》第3期, 1963。

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修饰(与范继淹合作) 《中国语文》第2期, 1964。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用字的出现频率的统计(与陆述生、郑宣沐合作, 署名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语言研究室) 《中国语文》第2期, 1966。

试论非谓形容词(与吕叔湘合作) 《中国语文》第2期, 1981。

“把”字连句省略 《汉语学习》第3期, 1982。

数字的称说和表达(署名丛一如) 《中国语文通讯》第3期, 1982。

谈谈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的析句方法 《语法研究和探索》(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把”字句否定式 《语法研究和探索》(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动宾组合带宾语 《中国语文》第6期, 1984。

“一个”别义试析(署名丛一如) 《中国语文通讯》第6期, 1985。

福建长汀(客家)话语音记略 《龙岩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第2期, 1986。

“至于”、“关于”不像是介词 《汉语学习》第1期, 1987。

福建长汀(客家)方言的连读变调 《中国语文》第3期, 1987。

“不”偏指前项的现象 《语法研究和探索》(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长汀方言名词后缀“哩”和“子” 《烟台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88。

长汀方言的代词 《中国语文》第3期, 1989。

修饰成分后见小集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89。

求实 得宜 致用——读《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6期合刊, 1990。

再说次动词 《语法研究和探索》(五), 语文出版社, 1991。

汉语中划分词遇到了什么困难? 《语言学百题》(修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从8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的语法学和修辞学——宜兴市八学者学术座谈会发言 《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91。

三个平面: 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黄山市十学者学术座谈会发言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2。

关于句法、语义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语法研究和探索》(六), 语文出版社, 1992。

长汀方言表“得到”和表“给予”的“得” 《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长汀客家人 《汀州客家研究》第1辑, 福建长汀, 1993。

客家风情·客家方言(与王马金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长汀方言及其分片 《客家纵横》增刊, 福建龙岩, 1994。

客家精神说略 《北京客家》第2期, 1994。

长汀话表可能的“V得”组合 《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 商务印书馆, 1995。

关于语法意义的层次性 《语法研究和探索》(七), 商务印书馆, 1995。

长汀方言助词“嚟”和“咧” 《语文研究》第2期, 1996。

长汀方言动词的体貌 《中国语文》第6期, 1996。

“AXX的”状态形容词的构成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论文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谈谈撰写语法论文的几个问题 《汉语学习》第6期, 1997。

议议客家方言语音、语法的关系 《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广东增城)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开幕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客家话)“烂漫”释义 《闽西日报》1998年8月24日。

饶宗颐 Ráo Zōngyí

饶宗颐（1917～ ），字固庵，一字伯子，号选堂，广东省潮安县人。1935～1937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省通志馆专任纂修。抗日战争初期因病滞留香港，其间曾为王云五主编之《中山大辞典》撰稿，并协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先后在广东省韩山师范学校、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广东文理学院、汕头华南大学执教。1949年移居香港，1952～1968年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其间于1962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1963年受聘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为永久会员。1968～1973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其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教授。1973～1978年，回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曾为法国科学中心远东学院研究员。1980年被选为法京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3年获法国索邦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暨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及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中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名誉教授。

饶宗颐学术研究的范围至为广泛，涉及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其著作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和书画等八大门类。今择其涉及语言文字学者略作介绍。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是饶宗颐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开创以“分人研究法”为纲、全面整理甲骨卜辞的新体例。此书例言指出：“治卜辞者，无不盛言分期，因有所谓‘断代’及‘分派’二种方法，……鄙见无论‘断代’、‘分派’，必先以分人研究为基础，本书之作，即在提出卜辞之分人研究法，使有卜人记名之刻辞，得一综合之整理。”全书二十卷，

八十多万字。卷一“前论”，卷二“贞卜人物记名辞式释例”，卷三至卷十七“贞卜人物事辑”，搜罗当时能见到的所有与“贞人”相关的甲骨资料，在每个“贞人”之下再细分“卜雨”、“卜晴”、“卜风”、“卜云气”、“卜月食”、“卜水”、“卜夕”、“卜旬”、“卜年”、“卜狩”、“卜往来”、“卜梦”、“卜疾病”、“卜祭祀”、“卜邑”、“卜征伐与方国”、“卜所见人物”、“杂卜”、“成语”等项，逐项罗列原始材料，随文诠释疏证，对关键问题则详细考辨。卷十八“备考”，卷十九“结语”，卷二十“附录”，附有“贞卜人物同版关系表”、“各期贞卜事类表”、“祭名索引”、“成语索引”、“地名索引”、“人名官名索引”等，极有参考价值。

饶宗颐主编《甲骨文通检》，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已出版五巨册，每册有饶氏长篇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如第一册前言论贞人问题与坑位。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一大型的甲骨文分类资料索引，为人们更多更好地使用甲骨材料、推动甲骨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饶宗颐利用长期在世界各地从事学术活动之便，不辞辛劳，搜求散失海外的甲骨资料，并加以整理刊布。有多种著作行世：《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海外甲骨录遗》、《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等。

战国文字研究也是饶宗颐长期耕耘的领域。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被盗掘出土，后来流失美国。饶宗颐对楚帛书的研究，数十年一直未曾停息，先后发表论文和著作多种。1967年，帛书收藏者沙可乐将放大十二倍帛书红外线照片一百一十张邮赠饶宗颐，饶氏根据这套照片制作了新的摹本，其精确度最高，与此前最有代表性的商（承祚）氏本和林巳（奈夫）氏本相比，可正确无误辨认的字竟激增了一百数十字，至此，知帛书实存字数可达九百二十二文。由于饶宗颐为学术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原始材料，并且新认出了百余帛文，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新的飞跃。李学勤曾指出帛书边文与《尔雅·释天》中的月名有关，惜其所据摹本边文残泐过甚，不易理解，故其观点未获认同。1964年饶宗颐在纽约对帛书原物作了仔细辨认和反复勘读，撰《楚缯书与〈尔雅〉十二月名核论》，证成李说，从此，帛书边文十二月名始被正式肯定下来，“始取（阌）终莖（涂）”的十二月序亦随之获得承认。由于帛书月名与其结构及性质密切相关，饶氏一贯主张以八行正置而十三行逆置的置图方式，阐释其因由说：

“甲篇（八行）道其常而乙篇（十三行）言其变，故甲篇居前而乙篇列后，前者顺写而后者倒书，所以昭其顺逆。两篇特殊结构的用意，可以推知。”此说揭示了楚帛书中间二篇颠倒为文的奥秘，是迄今最为合理的解释。以八行为正的置图方式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楚帛书新证》是饶宗颐三十多年研究经验和心得的结晶，在释读甲乙两篇帛文及某些疑难问题的探讨上，创获甚多。如据《易纬·乾凿度》知庖牺亦号大熊氏，与帛书篇首“曰故（古）大熊鬻戏”一语正合；据《墨子·非攻》知楚先世居于睢山，可证帛文“居于鼂”乃楚先所居之地，而“鼂”亦可定为“睢”之繁文；据《地母经》知女娲亦曰女皇，则帛文“某某子之子曰女皇”确指女娲，而由帛文鬻戏、女皇、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所组成的神话系统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均与楚之先世有关。帛书篇首残缺最甚的一段文字因此得以贯通。

除楚帛书外，饶宗颐对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楚地出土文献都深有研究，建树良多。例如，对曾侯乙墓钟磬铭辞若干待定的古字作了辨认，结合传世典籍中的乐律资料，对乐律术语、五声倍律的异名，以及一些乐律史上的问题试作说解，考知钟磬铭辞记载周、曾、楚、齐、晋各地不同的律名，而楚国使用的律名，则以吕钟为黄钟，六律中有四个称曰某钟，且特别指明其浊音，并不沿用周律，自成体系，此为前所未知。与曾侯乙编钟同出的漆箱盖朱书文字，饶宗颐第一个作了可靠的释文，不仅破译了这些古文奇字，还进而探讨了古代乐理与天文的关系，使漆书的天文学内容与同出乐器群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充分的揭示。日书是古代日者占候时日宜忌、预测吉凶的历书，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两个写本，共有竹简四百二十三枚、一万八千零四十字，这批材料出土后，一度受到冷落，饶宗颐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秦简日书的专著，通过“建除家言”、“稷辰”、“玄戈、招摇”、“反枳”、“归行”、“禹符、禹步、禹须臾”等十二个专题，结合传世典籍，详加疏释。如勘订《淮南子》“剽”与“杓”异文，证“反枳”即“反支”之殊写。林剑鸣尝称此书为研究秦汉数术的“奠基之作”。

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帛书《易经》、《老子》、《刑德》及医书上，如论文《帛书〈系辞传〉“大恒”说》指出，《周易·系辞》通行本“易有太极”句，帛书本作“易有大恒”，“极”之作“恒”，当是

汉以前《系辞传》的本来面目。而“大恒”转写为“太极”或“太一”，则是异名同实。“太一”在楚为主帅，而“恒”的道理在楚人著述中亦甚流行。再如帛书《刑德》中四仲之神有“湍王”、“摄氏”，饶宗颐认为“湍王”即颛顼，与炎帝相对之神，非颛顼莫属；“摄氏”即摄提，当即摄提，绝无疑问。颛顼、摄提之名，过去未见于出土文献，首见于帛书，弥足重视。“摄氏”或作“摄提”，既是星名，又是神名，往者或谓“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

饶宗颐是较早研究战国楚简的学者之一，1954年所撰的《战国楚简笺证》，董理疏释仰天湖楚简，不少发明至今仍为古文字学界所津津乐道。部分战国荆门楚简流失海外，1997年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训诂学学术研讨会上，饶宗颐作了题为《在开拓中的训诂学》的专题报告，发表并考释了《周易·睽卦》六三爻辞的一枚残简，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缁衣零简》以传世本《礼记·缁衣》合证，考释了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一枚楚简。郭店楚简发表后，饶宗颐又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从新资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派试论》、《从郭店楚简谈古代礼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等。

《说模𪔐、模糊、模糊》一文为俗字源考释之作，以杜甫《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适）》诗的多种刻本异文为例，结合苏轼《石鼓歌》及清人方贞观法书真迹，论证现代熟语“模糊”原当作“模𪔐”，从而对《汉语大词典》米部的“模糊”条和木部的“模糊”条作了补正。并将此词词源溯至春秋，以为莒国人名“‘瞽胡’当是‘模𪔐’的记音，古有是语，现在无人知道了。”“‘模糊’应该是‘模𪔐’的借音，原有当作模，完全没有错误，不应妄指‘模’为非。杜诗被刻成模糊，即其例证。模𪔐、模糊、模糊，多少年来，人们都在模模模糊之中……因草此文，予以澄清。”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全书分上下篇，共十节，约十六万字，是饶宗颐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此书多方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楔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从全新角度探讨汉字起源问题。饶氏指出中国很早的“书同文”政策造成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及文学上的形文、形声的高度美，终使汉字这一参天大树卓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学、书法艺术的连锁关系构成了汉文化的最大特色。此书还揭示了汉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的大

量线形符号，反映了古代闪族人使用字母并尝试采择陶符以代替借用楔形文的雏形字母之特殊现象，从而提出了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最后指出，不使用字母是中国古代就做出的明智抉择。

中西语言文字及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饶宗颐取得重要成就的方面。饶宗颐从小爱读佛书，谙熟佛典，后来对梵学有精深的研究，对汉语训诂学、音韵学也有深邃的修养。《尼卢致论（Nirukta）与刘熙的〈释名〉》一文，论述印度 Yaska 的《Nirukta》在语言学方面的见解，并论及中国东汉刘熙的《释名》。《Nirukta》作于公元前 700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训诂学著作。Yaska 认为所有的字都可以追溯其语源，最重要的原则是由动词以推求名词在语源上的涵义。这跟《释名》解释字义所持的见解和方法是相似的，在语源学上都有同样的贡献，而两者时间先后不同，地域不同，互相辉映，堪称远东两颗训诂学的牟尼珠。可惜印度学者只知把《Nirukta》与柏拉图的观点作不必要的比较，不懂得拿它来跟刘熙的著述作一衡量，而中国学人则对梵学几乎完全隔膜，向来训诂学家对《Nirukta》这部划时代巨著无一语道及。饶宗颐首次对《Nirukta》和《释名》这两部语源学名著作了比较研究。

《梵学集》共收论文二十七篇，论述梵学与音韵学者凡十一篇。在这十一篇论文中，分别讨论了汉语四声的起源问题、鸠摩罗什《通韵》所阐述的悉昙章以及悉昙章在我国传播的时代和过程、梵文十四音的内涵及各种异说、梵文四流母音“鲁流卢楼”的传译、取舍及在后代的应用与流变、佛咒用字“呬”的考释、六朝声律学所受梵学的影响等等。

早在汉代梵学传入并产生广泛影响之前，我国文人由于语音知识的积渐感悟而创造了反切。但是，齐梁时代出现了属于反切辗转运用的“反语”，则明显地受到梵学拼音知识的影响和推动。沈约有纽字之图，撰《四声谱》，饶宗颐认为当与周颙所作“体语”有渊源关系：“以纽切字，实倡自周颙。颙好为体语。体语者，即梵语子音之体文。……体文取义殆本诸南印度字母。周颙既善体语（文），是深明梵音纽字，故能以切字为纽以论四声，为沈约之前导。约进而造《四声谱》，取以制韵，定其从违，示人以利病，遂成独得之秘。”并指出：“余谓沈谱之反音，乃从悉昙悟得。”“周颙之体文合四声，可谓华梵比较语音学孕育之奇葩。”饶宗颐的研究，足以揭示汉语音韵学史上韵图产生之源。

陈寅恪曾经认为汉语“四声”的产生是由于受了梵学的影响，陈氏在

《四声三问》一文中指出：“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这是因为“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南齐永明之世）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陈氏之说颇受音韵学者的推崇和引用，俞敏提出过反对意见，饶宗颐则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对陈说作全面而具体的剖析，先后发表了《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四声说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等论文，论证陈氏谓四声仿自转读、创自周颙及沈约之说不可靠。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撰文为陈氏辩解，李新魁力证饶说确不可易。悉昙章在我国的传播，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颇大影响，其传入时间通常认为在唐代，但饶宗颐指出，后秦鸠摩罗什所撰的《通韵》，即已包含悉昙章的内容。从而将悉昙章在我国传播的时间大大提前。

《通韵》中谓梵文“本为五十二字”“就里十四之声，复有五音和合”。五十二字是指五十三个字母，十四声是指梵文的十四音，五音是指五类“毗声”。饶宗颐一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十四音”的诸家异说，概括为鸠摩罗什、道朗、智藏、宝亮、僧宗、道亮、智秀、僧旻八家的不同说法；另一方面，论述“梵文四流母音 $\bar{r}$ 、 $\bar{R}$ 、 $\bar{l}$ 、 $\bar{L}$ 与其对中国文学之影响”，认为“唐代《悉昙章》中以‘鲁流卢楼’四字为和声，到了后世，遂起很复杂的变化”。其用作和声的技巧，已由鸠摩罗什传到了现代。饶氏进而考定这四流音在我国各种典籍中的译法以及它们存废的情形，指出：“ $\bar{r}$ 、 $\bar{R}$ 、 $\bar{l}$ 、 $\bar{L}$ 四个字母，除 $\bar{r}$ 母音外，已有许多世纪未用。现代字母并无此四字。中国尚存这四个字母，用途又截然不同，真是奇妙。”由于悉昙章的传入，促成了汉语字母的产生，并导致了汉语等韵图的出现，使音韵学在其内容上围绕等韵图及其制作、拼读原理而创造的“等韵门法”等的产生，从而形成了“汉语等韵学”。饶宗颐指出：“从悉昙音理可联想到种种门法，后来之等韵学，亦由悉昙孳乳而来。”

明人赵宦光，撰有《悉昙经传》，罕有流传，南京图书馆有此书丁丙旧藏之本，饶宗颐承该馆以复印件相赠，历经多年暇时细读，撰成《赵宦光及其〈悉昙经传〉》一文，阐述赵书在音韵学史上的价值，置于卷前，以《悉昙经传》为本编，以其他相关研究资料为附编，交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饶宗颐指出，赵氏颇有眼光，发现刘鉴依《篇海》排列之韵中首字，编入《四声等子》，已知《等子》乃沿袭金代韩孝彦、道昭父子之